

杜威的日本之行与中国之行的比较研究

—从教育学的视角出发—

刘 幸

(广岛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

【摘要】著名教育家杜威曾于二十世纪初先后到访日本与中国，广开演讲，参观学校，对两国的教育都有影响。但是比较而言，杜威日本之行的影响远不及中国之行。前者时间较短，影响面局限于学术界，而且很快受到了打压；后者时间更长，影响更广，并且使得杜威的教育思想通过立法的形式获得了认可。这一现象是由当时两国在社会背景、思想背景、教育状况等多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这说明，对外来教育思想的吸收，始终是和本国教育的实情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关键词】杜威；中国；日本；教育学

一. 导言

纵览整个二十世纪，杜威在世界范围内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影响，只怕少有人及。针对传统教育中的“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杜威大力提倡“儿童中心”“活动中心”“经验中心”，为现代教育理论奠定了坚固的基石；同时，他也积极投身教育实践，创办实验学校，为教育工作者树立了典范。其影响已经超出了美国本土，远播世界各地。

在这当中，中国人和日本人又对杜威别有一番感情。因为在二十世纪初，杜威本人曾先后到访日本与中国，既发表演讲，也参观学校，而且滞留的时间都不算短。在两国学者看来，杜威此行对两个国家都曾产生深远影响。日本学者森章博认为杜威的日本之行与当时日本国内的“新教育运动”有密切联系¹；杜威的学生，也是杜威中国之行的主要陪同者胡适则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²

对于杜威在日中两国先后的游历过程及其对两国教育各自的影响，相应研究并不匮乏，而且不断有专著涌现。如元青所著《杜威与中国》(2001)、Jessica Ching-Sze Wang 所著《杜威在中国》(John Dewey in China, 2007)、关松林所著《交流与融合：杜威与日本教育》(2008)等等。在日本学界，1969年出版的《杜威研究：杜威来日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デューイ研究：デューイ来日五十周年記念論文集)中，三浦典郎、森章

¹ 森章博「日本におけるジェン・デューイ研究の歴史」『デューイ研究：デューイ来日五十周年記念論文集』玉川大学出版部 東京 1969 第104頁。

² 转引自程巢父《纪念五四运动及杜威来华讲学九十周年》《文汇报读书周报》2009-05-15。

博等人通过论文详细追述了杜威日本之行的情况。北村三子的论文《1919 年的杜威与日本》(1919 年のデューイと日本) 也对杜威当时的思想有过细密的分析。

然而, 目前还少有学者将杜威的日本之行与中国之行进行比较研究。事实上, 日本与中国同为东亚的重要国家, 在当时都处于各个方面急剧变化的时代, 教育也概莫能外。而且杜威此行正好是一前一后, 紧锣密布地展开的。对其进行比较研究, 或许可以揭示出当时日中两国在教育上的诸多异同, 对今天的我们仍不无借鉴意义。值得说明的是, 杜威身兼教育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等多重身份, 其两国之旅的影响所及, 远不止教育界。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视角出发对此进行比较研究都将是很有意义的课题。然而限于学力和篇幅, 笔者在这篇文章中将着力从教育学的视角出发, 对此加以探讨。余下的课题, 尚有待来人。

二. 杜威日本之行与中国之行概览

杜威对东方国家素来抱有兴趣。1918 年, 在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带薪休假之后, 杜威便打算偕同夫人前往日本。曾经留学美国并且与杜威相识的小野荣二郎此时担任日本兴业银行副行长, 他极力邀请杜威来日演讲, 并请日本著名商人涩泽荣一承担了杜威夫妇访日的全部费用。

1919 年 1 月 22 日, 杜威夫妇从美国出发, 2 月 9 日抵达横滨。第二天, 《东京朝日新闻》即刊载出杜威来日的消息, 并附上杜威夫妇的照片。不久, 杜威在中国的弟子胡适、陶行知等人也得知了他到访日本一事, 便合力邀约杜威在日本之行后前往中国。为此, 当时负责出国考察战后教育状况的郭秉文和陶孟和在途经日本的时候还专门拜访了杜威, 表达这一意愿。很快, 杜威的中国之行也落实了。

杜威的日本之行合计两月有余的时间, 这当中最重要的活动是从 2 月 25 日到 3 月 21 日, 每周二和周五在东京帝国大学定期举办的连续演讲“现在哲学的位置——哲学改造的若干问题”, 演讲内容后来编定为《哲学的改造》一书在美国出版。正如关松林所注意到的, 这当中“仅有一讲与教育有关”³。此外, 杜威也走访了日本女子大学及其附属丰明小学校 and 幼稚园, 并发表了题为“哲学、宗教和教育的新趋势”的演讲。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 杜威在参观学校的时候, “尤其对日本的礼法、薙刀、茶道、插花和古琴饶有兴趣。”⁴之后, 杜威走访镰仓、京都等地, 进行演讲, 参观学校, 还拜访过日本临济宗名僧释宗演。4 月 28 日, 杜威夫妇动身前往中国。

30 日, 杜威夫妇抵达上海。5 月 3 日, 杜威到江苏省教育会(位于上海市西门外林荫路)演讲“平民主义的教育”, 由此开始了他在华巡回演说的历程。日本学者川尻文彦

³ 关松林〈杜威教育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日本问题研究》2010(1) 第 2 页。

⁴ 三浦典郎「1919 年当時の日本におけるデューイの記録」『デューイ研究: デューイ来日五十周年記念論文集』玉川大学出版部 東京 1969 第 91-92 頁。

已经注意到，“杜威在日本主要讲哲学，而在中国的最初演讲，即在江苏省教育会所作的有关‘平民教育’的演讲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也就是说，中国向杜威求教的首先是关于‘教育’的见解。这一点和日本形成显著的对比。”⁵至5月底，杜威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上海、杭州、南京一带。5月29日，杜威夫妇北上抵达北京，开始在北京各个教育团体进行学术演讲，其间还曾赴太原参加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3月。之后，杜威南下讲学，在江浙一带进行巡回演说，一直到7月又重返北京。

在南京的时候，杜威原先与哥伦比亚大学约定的一年假期已经届满。但中国教育界显然对杜威仍有极高的热情，通过北京大学向哥伦比亚大学发送电报，请求延聘杜威一年，获得了允许。事实上，当初“直到抵达中国之前，杜威都仍然没有亲自答应要在中国待上一年之久。他需要评估一下中国方面的意愿，以便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⁶很明显，经过长时间的相处，杜威与中国教育界的关系日臻融洽，完全没有了当初的挂虑。

返回北京之后，杜威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用两个学期专门讲授“教育哲学”，其间也曾受邀到各地进行演讲，一直到第二年秋天延聘期满。在合计两年零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杜威行遍中国11个省，进行了大大小小共计200余场演讲，获得了中国人普遍的欢迎，可谓盛况空前。1921年8月2日⁷，杜威夫妇从青岛离开中国，返回美国。

三．两次行程对两国教育影响之比较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杜威在日本只待了两月有余，在中国却待了两年有余。尤其后者是在获得杜威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认可后，延长一年的结果。公允地讲，杜威对中国之行显然投入了更多的心血和感情，其影响也超过前者。

杜威的日本之行，影响主要在学术界，而且主要是对实用主义理论抱有兴趣的人士，例如原先就在美国留学，此时已经回日本任教的田中王堂、帆足理一郎等人。另外，也有一些当时的大学生，借此机会与杜威本人进行交流，从而奠定了将来的学术旨趣，例如当时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永野方夫。1957年日本杜威学会成立的时候，就是由他担任首任会长。日后的教育心理学家冈部矢太郎，也获得了杜威本人的细心指点。不过，杜威日本之行的亲历者曾经注意到，杜威在东京帝国大学的讲座“最初听讲者逾1000人，三次之后降到了500人，最后的一次大概3、40个人。”⁸虽说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

⁵ 川尻文彦，〈杜威来华与“五四”之后的教育界〉《社会科学研究》2009（6）第143页。

⁶ Jessica Ching-Sze Wang. John Dewey in China [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7, p3.

⁷ 关于杜威抵达中国和离开中国的时间，本文取信于王剑〈“杜威中国之行”若干史实考释〉《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3）——中国教育制度史研究》，2009。

⁸ 北村三子「1919年のデューイと日本」『駒澤大学教育学研究論集』2010（26）第21頁。

原因是当时的翻译工作有所欠缺，但这一条材料至少说明，杜威日本之行在当时造成的影响不宜过分夸大。今天的一些学者在回溯这段历史的时候似乎忽略了这一点，将杜威当时在日本的影响描绘得有些失真。

除了前述直接的影响之外，杜威此行也对当时日本的“大正新教育运动”有不少间接的影响。这场“新教育运动”酝酿于明治末期，随着“大正民主时代”的到来而兴起，其核心理念是批评整齐划一的教学法，强调对儿童个性的尊重，提倡生活经验。这和杜威所揭橥的“儿童中心”理论明显一脉相承。虽然因为滞留日本的时间太短，杜威与相关人士似乎少有直接接触，但是，在杜威离开日本之后的一段时间后，这场运动确实在蓬勃展开，1921年8月1日甚至在东京展开了“八大教育主张系列演讲会”。参与其中的柳泽正太郎等教育家日后回忆起来也都承认受到过欧美思想，尤其是杜威思想的影响。应当说，杜威的日本之行对此是起到了推动作用的。然而，正如“大正民主时代”倏忽即逝一样，“新教育运动”也很快被打压，步入低谷。杜威的影响也随之趋于微弱。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杜威在中国教育界所受到的高度重视。杜威在华期间，各大报刊纷纷及时报道杜威的讲座内容。有学者甚至感叹：“翻看五四时期的报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杜威在华巡回演说记录稿充斥，堪称连篇累牍。”⁹商务印书馆等知名出版社很快就将杜威的演讲整理成册，发行出版，而且连连再版。杜威多次在北大、南高师、北高师等中国教育重镇进行讲座，其辐射面非常之广。陶行知、陈鹤琴等一批深受杜威思想影响的中国本土教育家也慢慢在日后崭露头角。

杜威此行对中国教育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教育理论的革新。当时出版的各种教育学理论著作，几乎都受到了杜威思想的影响。在时间上与杜威中国之行靠得比较近的是中华书局于1922年出版的王炽昌编著的《教育学》。其“编辑大意”就明确说到此书“本现代民本主义、实验主义及自动主义¹⁰而编辑”。而当时发行量最大的一部教材，即正中书局于1935年出版的由吴俊升、王西征合编的《教育概论》将开篇第一章就命名为“儿童的发展”，随后两章谈“学习的功能”和“社会的适应”，然后才谈教育的意义与目的。杜威教育思想的旨趣也是非常明显的。随着这样一批教育学教材的普及，“儿童中心”等理论在中国扎下了根。

另一方面则是教育实践的展开。杜威的学生克伯屈所创的“设计教学法”等一系列有着杜威教育思想烙印的新式教学方法渐渐传入中国。这种方法以儿童为中心，由儿童与教师共同拟定目标和活动计划。儿童在真切的活动中解决问题，获得成长。教师则以辅助的角色进行指导和评定。这一方法尤其在小学阶段获得了成功。中国传统的以书本为核心的教育方式日益受到冲击。即便是书本，也日益注重提高趣味性和生活感，拉近

⁹ 元青〈杜威的中国之行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2001（2）第139页。

¹⁰ “自动主义”这个词今天在教育学上已经不常见了。它指的是在授课时，以儿童自己的活动为中心，教师立于旁观地位，只尽辅导之责。很明显，这也和杜威的教育理论有密切关联。

与儿童的距离。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一批经典教材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杜威曾经与会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上，学制改革被定为首要问题。这次年会明确了“教育之真义”要“以儿童为本位”，“养成健全人格，发挥共和精神”¹¹，这几乎不折不扣就是对杜威教育思想的阐发。两年后，在第七届年会上，“学制系统草案”得以通过。1922年9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学制会议，修订这一草案。修订之后的草案经教育部审定，于11月1日以大总统令正式颁布实施。这就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壬戌学制”。“壬戌学制”订立七条标准，其中的“适应社会进步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生活教育”、“多留地方伸缩余地”等提法明显有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子。杜威的教育思想就这样以立法的形式，进入了中国的教育纲领之中，其影响之巨大和深远，是杜威思想在日本的影响程度远远不可及的。

四. 原因分析

日本人勤奋好学，且善于吸收外来文化，这是大多数人的共识。然而，就杜威的这一次东亚之行而言，毫无疑问，中国人的热情程度要远远高过日本人，中国的教育界对杜威教育思想的接纳程度也高过日本教育界。即便站在杜威的角度来说，他与中国教育界的关系也明显更为密切。这一现象是由当时种种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的。

从当时的理论背景来看，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教育理论，始终是师法德国的，教育哲学也同样如此，这种影响到今天依旧非常显著。德国哲学是欧洲大陆哲学的重镇，以高度抽象和逻辑严密而著称，尤其后一个特点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这也是赫尔巴特的理论在当时的日本非常流行的深层原因。因为赫尔巴特的“五段教学法”正好构筑了一个逻辑严密的教学体系。相对而言，以杜威实用主义为代表的美国哲学在当时多被视为对哲学的庸俗化。杜威的教育哲学从经验入手，以此为基石构建教育理论体系；然而德国的哲学与教育哲学讲究的是先验，这一点在康德那里体现得最明显¹²。从这个意义上讲，杜威的教育思想与当时日本的主流教育思想大异其趣，也受到了其排斥。关于这一点，即便是支持杜威理论的森章博等学者也是承认的。

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天皇制下的日本依旧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尤其自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之后，日本的教育始终摆脱不了这一背景。这种教育要培养的是为国尽忠的“臣民”¹³。然而，哪怕单单瞥一眼书名《民主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也知道，在杜威的理论中，教育天然是和民主挂钩的。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形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教师和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共同参与者，理应建立一种自

¹¹ 吴健敏〈杜威的教育思想对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教育评论》2001(6) 第59页。

¹² 彭正梅《现代西方教育哲学的历史考察》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 2010 第30页。

¹³ 中野光「大正自由教育の研究」黎明書房 名古屋 1996 第9頁。

由而民主的关系。这种理论在当时日本的社会环境中，是不容易被接受的。1919年，帆足理一郎在翻译这部书的日文版时，就改换了书名，将副标题“教育哲学概論”换做了正标题出版。这个微妙的改动很可以见出当时的社会氛围。及至大正时代结束，杜威的理论被打压也就不难理解了。

因此，只有等到二战结束，美国在日本推行民主政治之后，杜威的教育学理论才可能重新复活。事实上，美国的专家学者给战后日本教育带来的，也正是杜威的理论。当然，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然而，迎接杜威的中国却处在一个不同的社会阶段里。杜威抵达中国后没有几天，就赶上了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提倡的“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在这个时候又一次成为了全社会最响亮的口号。而在学者 Ching-Sze Wang 看来，杜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他的中国学生们视为了“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化身。¹⁴杜威推崇民主，前面已经谈过，这里不再赘述。同时，杜威也推崇科学的价值，对于社会问题上倾向于采取一种实验的、科学的方法去解决。这一点尤其得到了胡适的认同。杜威的这两个思想特质正好应对了当时中国人最迫切的思想问题，他的流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杜威的教育思想更是与当时中国教育的实情格外贴合。事实上，积极迎接杜威来华，并且在当时中国的教育决策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蔡元培、胡适等人，都是亲身经历过中国的传统教育，尤其科举教育，并且深知其中弊病的一辈人。他们都曾明确地指出，科举教育最大的问题，便在于将孩子的视野束缚于四书五经之中，同时让他们将大量的精力消耗于对八股诗文的钻研。这样的教育在晚清的大形势下已经无法维持，自然会遭到淘汰。然而，传统教育破除容易，新式教育的建立却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袁世凯时期甚至出现了“尊孔读经”的逆流。近代中国风雨飘摇，中华民国政府在成立了数年之后才迎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教育的建设问题才有可能提上议程。杜威的中国之行恰恰在这个时候展开。他的教育理论强调经验，关注儿童，注重教育与社会的结合，这些特征都符合了当时中国现代教育建设的需求，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并最终进入教育纲领之中。因此，中国教育界对杜威思想的积极吸纳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的。

五. 结语

杜威的东亚之行，距离今天快要有一百年了。然而，今天的中国学者依旧在孜孜不倦地阅读和研究杜威的著作。尤其在2015年，38卷本的《杜威全集》全部译为中文出版；而即便是以翻译强国著称的日本，至今也还没能见到这样一套日文版的《杜威全集》。这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人对杜威的重视程度是在日本之上的。

¹⁴ Jessica Ching-Sze Wang. *John Dewey in China* [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p15-20.

教育思想从来都是和教育实践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和更广阔的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个国家对外来教育思想的吸收，也一定是和本国的教育实践、教育问题和社会背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纷繁复杂的外来教育思想中，唯有那些能切实回应本国教育问题的，才有可能扎下深根，产生深远的影响。杜威的日本之行与中国之行之所以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激起了不同的反响，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正是因为这个道理。

参考文献

1. 程巢父 〈纪念五四运动及杜威来华讲学九十周年〉《文汇读书周报》2009-05-15。
2. 川尻文彦 〈杜威来华与“五四”之后的教育界〉《社会科学研究》2009（6）。
3. 关松林 〈杜威教育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日本问题研究》2010（1）。
4. Jessica Ching-Sze Wang. *John Dewey in China* [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5. 北村三子「1919年のデューイと日本」『駒澤大学教育学研究論集』、2010（26）。
6. 中野光『大正自由教育の研究』黎明書房 名古屋 1996。
7. 日本デューイ学会『デューイ研究：デューイ来日五十周年記念論文集』玉川大学出版部 東京 1969。
8. 彭正梅 《现代西方教育哲学的历史考察》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 2010。
9. 王剑 〈“杜威中国之行”若干史实考释〉《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3）——中国教育制度史研究》，2009。
10. 吴健敏 〈杜威的教育思想对 20 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教育评论》2001（6）。
11. 元青 〈杜威的中国之行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2001（2）。